教育學文摘
Abstracts of Education
ISSN Print: 3079-5443
ISSN Online: 3079-5451
https://doi.org/10.63313/EDU.4005

湖北民族地区乡村智慧文旅职业教育校地协同育人模式创新研究

叶世灏[1.2.3]

[1]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湖北 宜昌
[2]三峡文旅融合产业发展研究中心，湖北 宜昌
[3]暨南大学，广东 广州

发布日期：2026年10月15日

摘 要

在文旅深度融合与职业教育数字化战略双重驱动下，乡村智慧文旅已成为湖北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核心产业抓手，而本土化技能人才供给不足则是制约产业提质升级的关键瓶颈。本研究以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宜昌市长阳与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为核心研究场域，综合运用文献研究、实地调研、案例分析等方法，系统梳理乡村智慧文旅与职业教育校地协同育人的研究脉络与理论基础，深入诊断当前湖北民族地区校地协同育人存在的主体协同性不足、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脱节、民族文化与智慧技术融合度低、长效运行机制缺失等现实困境。在此基础上，构建“四维联动、三阶递进、双向赋能”的乡村智慧文旅职业教育校地协同育人创新模式，明确政府、职业院校、乡村社区、文旅企业四大主体的权责边界与协同逻辑，并从专业共建、课程共融、基地共建、师资共育、成果共享五个维度设计具体实施路径，配套提出政策、组织、资源、制度四位一体的保障机制。研究成果可为湖北民族地区培育本土化乡村智慧文旅人才、推动校地协同育人长效落地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方案，也可为中部同类民族地区文旅职业教育改革提供借鉴。

关键词

乡村智慧文旅；职业教育；校地协同育人；湖北民族地区；产教融合

Research on the Innovation of School-Local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Mode for Rural Smart Culture and Tourism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Hubei Ethnic Minority Areas

Shihao Ye[1.2.3]

[1]Hubei Three Gorges Technical University, Yichang 443000, China
[2]Research Center for Three Gorges Cultural Tourism Integration Industry Development, Yichang 443000, China

文章引用：叶世灏. (2026). 湖北民族地区乡村智慧文旅职业教育校地协同育人模式创新研究. 教育学文摘, 2(2), 71 - 84. ISSN Print: 3079-5443, ISSN Online: 3079-5451.
DOI: 10.63313/EDU.4005

[3]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Abstract

Driven by the dual strategies of in-depth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and digitaliz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rural smart culture and tourism has become a core industrial driver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of Hubei Province, while the insufficient supply of localized skilled talents has become a key bottleneck restricting the quality improvement and upgrading of the industry. Taking Enshi Tujia and Miao Autonomous Prefecture, Changyang Tujia Autonomous County and Wufeng Tujia Autonomous County of Yichang City as the core research fields,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sorts out the research context and theoretical basis of school-local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for rural smart culture and tourism vocational education by comprehensively adopting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 research,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case analysis. It further diagnoses the practical dilemma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school-local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in Hubei ethnic minority areas, including insufficient subject collaboration, disconnection between talent training and industrial demand, low integration of ethnic culture and smart technology, and lack of long-term operation mechanism.

On this basis, this study constructs an innovative school-local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mode for rural smart culture and tourism vocational education featuring "four-dimensional linkage, three-stage progression, and two-way empowerment", and clarifies the rights-responsibility boundaries and collaborative logic of four main subjects, namely the government, vocational colleges, rural communities, and cultural and tourism enterprises. Furthermore, it designs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paths from five dimensions: joint major construction, integrate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co-construction of training bases, joint cultivation of teaching staff, and sharing of research outcomes, and puts forward a four-in-one guarantee mechanism covering policy, organization, resources and system. The research results can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and practical schemes for cultivating localized rural smart culture and tourism talents and promoting the long-term implementation of school-local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in Hubei ethnic minority areas, and also offer reference for the reform of culture and tourism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similar ethnic minority areas in central China.

Keywords

Rural Smart Culture and Tourism; Vocational Education; School-Local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Hubei Ethnic Minority Areas;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Erytis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同时将“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作为教育改革的核心方向。2023 年印发的《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进一步强调，职业教育要主动对接区域产业发展需求，深化校地协同、产教融合，为乡村振兴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输送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在此背景下，智慧文旅作为数字技术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的新业态，已成为推动乡村产业转型升级、激活民族地区发展内生动力的重要抓手[1]。

湖北民族地区主要包括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以及宜昌市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五峰土家族自治县等区域，拥有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与生态旅游禀赋，是湖北省乡村文旅发展的核心承载区。近年来，随着数字乡村建设的持续推进，湖北民族地区乡村文旅产业逐步向智慧化、体验化、融合化方向转型，对兼具民族文化素养、智慧技术应用能力与乡村运营能力的复合型技能人才需求持续攀升。职业教育是培养本土化技能人才、服务区域产业发展的核心载体，校地协同育人则是打通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壁垒的关键路径[2]。

当前湖北民族地区职业院校文旅类专业虽已开展多种形式的校地合作与产教融合实践，但整体仍存在合作层次较浅、协同主体单一、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适配性不足等问题，难以有效支撑乡村智慧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基于此，本研究聚焦湖北民族地区乡村智慧文旅产业发展的人才需求特征，系统剖析当前职业教育校地协同育人的现实困境，构建本土化的校地协同育人创新模式与实施路径，以期为湖北民族地区培育高素质乡村智慧文旅技能人才、推动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方案。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2.1. 核心理论基础

2.1.1. 人力资本理论

人力资本理论由 Schultz 于 1961 年系统提出，该理论突破了传统经济理论仅关注物质资本的研究范式，明确指出教育与职业技能培训是提升劳动力质量、驱动区域经济增长的核心内生动力，人力资本积累是推动产业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关键源泉[3]。对于乡村民族地区而言，职业教育通过对在地劳动力开展系统化的技能培训与素养提升，能够将人口红利转化为人力资本红利，为乡村智慧文旅产业发展提供持续的人才支撑。这一理论确立了职业教育赋能民族地区乡村产业发展的底层逻辑，也是本研究探讨校地协同育人价值的核心理论依据。

2.1.2. 协同学理论

协同学理论由 Haken 于 1969 年创立，该理论揭示了复杂开放系统中，多元主体通过非线性的相互作用，能够实现从无序到有序、从分散到聚合的自组织演化，最终达成系统整体效能大于部分之和的协同效应[4]。校地协同育人系统是由政府、职业院校、乡村社区、文旅企业等多元主体共同构成的复杂开放系统，各主体拥有不同的资源禀赋与利益诉求，通过协同机制的构建能够推动资源共享、责任共担与利益共赢，实现人才培养效能与产业发展效益的双向提升。协同学理论为本研究构建多元主体联动的校地协同育人模式提供了核心分析框架。

2.1.3. 产教融合理论

产教融合是职业教育的核心办学特征，其核心内涵在于推动产业需求与教育教学深度对接，将产业标准、岗位能力、真实项目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实现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机衔接。国内学者朱德全等指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技术逻辑在于以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为核心，通过产教融合打通教育与产业的壁垒，实现职业教育与区域产业的同频共振[5]。产教融合理论为本研究设计校地协同育人的实施路径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指导。

2.2. 国内外研究现状

2.2.1. 国外研究进展

国外关于职业教育与乡村产业协同发展的研究起步较早，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已形成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与实践范式，整体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理论奠基期（20 世纪 60 至 90 年代），核心是构建职业教育服务地方产业发展的底层理论框架。除人力资本理论与协同学理论两大核心支柱外，Reimer 于 1971 年率先突破传统封闭化校园育人模式的局限，提出教育必须与地方社区、产业场景深度融合的核心观点，打破了职业教育的空间边界，为校地协同育人提供了早期的模式构想[6]。此后，Shinn 与 Cheek（1981）、Wettayaprasit 与 Birkenholz（1995）等学者聚焦乡村农业职业教育领域，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职业教育与地方乡村产业、在地社区协同办学的实践成效，构建了职业教育服务乡村产业发展的早期项目模型[7][8]。Stone（1995）、Lockwood（1996）进一步聚焦校社协同的具体运行机制，对比分析了不同协同模式的实践效果，提炼了校地协同育人落地的核心要素[9][10]。Luft（1996）还关注到多元文化背景下职业教育的在地化适配问题，为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与地方发展的协同研究提供了早期探索方向[11]。

第二阶段为实践探索期（21 世纪初至 2015 年），研究重心转向校地协同育人的本土化实践与民族地区文旅人才培养。随着全球乡村旅游与原住民文旅产业的规模化发展，职业教育与地方文旅产业的协同成为研究热点。Sanders 与 Harvey（2002）以校社协同的职业教育办学案例为样本，论证了职业教育与地方社区深度协同的核心逻辑与实施路径，为校地协同育人搭建了早期的实践框架[12]。Strathdee（2003）以新西兰职业教育体系为研究对象，实证验证了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对地方社会资本积累、本土产业人才供给的核心驱动作用，明确了职业教育同时服务地方社区发展与产业升级的双重价值[13]。Zeppel（2006）的经典著作聚焦原住民生态文旅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系统剖析了民族地区文旅产业的人才需求结构与能力标准，论证了职业教育与地方社区、原住民群体协同培养本土文旅人才的核心路径，填补了民族地区文旅职业教育协同育人的研究空白[14]。Cooper 等（2014）系统梳理了大学—社区协同合作的多元成熟模式，明确了校地协同育人中院校、社区、产业主体的权责边界、联动机制与利益分配方式，搭建了校企社多元主体协同育人的主流模式框架[15]。Drahota 等（2016）通过系统性文献综述，进一步验证了社区—学术机构协同合作的实践成效与核心梗阻，提炼了校地协同模式落地的关键保障要素[16]。

第三阶段为创新深化期（2015 年至今），数字技术赋能文旅产业与职业教育融合成为研究前沿。Navío-Marco 等（2018）通过对 30 年研究历程的复盘，明确将 2015 年界定为文旅产业从基础信息化向全域智慧化转型的关键分界点，证实了新一代数字技术对文旅产业形成了颠覆性、全链条的重构效应[17]。Khatri（2019）、Yuan 等（2019）、Cai 等（2019）通过对文旅信息技术领域文献的系统计量分析，清晰呈现了该领域研究从单一技术应用向智慧旅游目的地建设、数字化游客体验管理延伸的演进趋势[18][19][20]。Muniz 等（2021）构建了智慧旅游目的地游客体验管理框架 SMARTUR，系统论证了数字技术对文旅产业运营逻辑、岗位设置与核心能力要求的全面重塑，为智慧文旅人才培养体系研究提供了明确的产业端依据[21]。Asif 等（2024）、Ferreira 等（2025）进一步锁定了生成式 AI、数字孪生等前沿技术在文旅领域的应用趋势，明确了当前文旅产业对复合型数字文旅人才的全新需求，也倒逼旅游职业教育开展育人模式与协同机制的系统性创新[22][23]。Prasetya 等（2025）指出，人工智能技术正在重塑职业教育的教学模式与评价体系，为职业教育对接智慧产业需求提供了全新的技术支撑[24]。

2.2.2. 国内研究进展

国内关于乡村文旅与职业教育融合发展的研究始终与国家战略同频共振，整体可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为基础探索期（2000—2017 年），核心是完成乡村旅游职业教育研究的基础构建。2008 年郭锐等以贵阳市为样本开展本土化调研，首次系统揭示了国内乡村旅游发展与职业教育供给不匹配的现

实矛盾，开启了该领域的实证研究先河[25]。苏林忠（2010）进一步夯实了该领域的核心价值共识，明确提出乡村旅游与农村旅游职业教育是共生发展关系，确立了“职业教育是破解乡村旅游人才瓶颈的核心路径”的基础逻辑[26]。刘玉芝（2011）针对行业痛点提出了多层次、多类型的乡村旅游职业教育发展模式[27]；周志宏（2012）通过系统的案例与文献分析，全面梳理了乡村旅游产业同质化、职业教育体系与产业脱节的双重困境，构建了“政府引导—校企合作—体系完善”的基础发展路径[28]。2015 年后，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研究维度进一步多元化，李小娟率先分析了乡村旅游转型升级对职业教育培养体系的全链条影响[29]；崔萃首次关注到“互联网＋”时代乡村旅游的发展新常态[30]；林丽则突破传统校园办学局限，提出校企协同育人的新思路[31]。

与此同时，民族地区本土化研究同步萌芽，张博文等、黄爱莲等率先提出民族地区旅游职业教育的本土化发展逻辑，前者明确了民族地区旅游教育需以民族文化传承人为核心培养目标，后者搭建了政府、学校、企业三方协同的“产学研”合作教育框架[32][33]。乔联蓉（2010）进一步聚焦民族地区旅游职业教育的独特性，明确了适配区域产业发展的人才培养目标与核心规格[34]；吴婷婷等（2015）、苏晓红等（2016）则推动研究向“民族文化与职业教育深度融合”方向深化，构建了民族文化融入旅游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基础模式[35][36]。

第二阶段为快速发展期（2017—2022 年），乡村振兴战略驱动下校地协同与民族地区文旅职教研究爆发式增长。唐智彬（2018）从社会资本视角探讨了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校地协同发展模式，提出校地协同的核心在于推动农村职业学校社会资本的再生产，为该领域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2]。柳建华（2019）从高职教育视角系统梳理了校地协同育人服务乡村振兴的保障措施与实施路径，提出了订单式培养、双师型队伍建设等具体策略[37]。朱运海等（2021）以湖北地方高校旅游管理专业为样本，基于 CBE 理论构建了产教融合校地协同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为中部地区相关研究提供了本土化实践参考[38]。

朱德全、石献记（2021）系统阐释了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技术逻辑与价值旨归，明确了职业教育以技术型人才培养为核心、服务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成为该领域的标志性理论成果[5]。与此同时，大量实证研究围绕农村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现实困境与优化策略展开，张志增（2017）率先明确了农村职业教育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抓手[39]；张旭刚（2018）、路艳娇（2019）、马宽斌（2020）分别从不同维度梳理了现实困境并提出针对性策略[40][41][42]；孙红霞（2021）进一步剖析了农村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内在机理[43]；朱忠义等（2021）则聚焦高职教育产教融合，提出了赋能乡村振兴的具体推进策略[44]。

在民族地区研究领域，蒋友财、邹雪（2018）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为例，探索了少数民族地区文旅产业与高职教育产教融合的具体路径[45]；李晓鹏等、贺菁等分别以贵州职业院校为样本，针对山地旅游专业人才培养困境提出了课程优化、校企合作深化等具体策略[46][47]；贾巧云、刘益（2019）以南疆民族地区为样本，通过实证调研分析了实践教学需求特征，提出了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建议[48]。

第三阶段为转型深化期（2022 年至今），智慧文旅与职业教育校地协同创新成为研究前沿。张骏等（2022）率先从科技革命视阈提出“双智共驱”的文旅职教人才培养改革模式，为智慧文旅背景下的职教改革奠定了基础框架[49]。陈丹等（2022）针对智慧文旅时代的市场需求，探讨了旅游专业校企合作实践基地的建设模式与实施路径[50]。周泓伶（2025）针对高职旅游管理专业校企合作实践教学的现实问题，构建了以学生智慧职业能力发展为核心的实践教学模式[51]。陈荟如（2025）聚焦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专业，剖析了智慧文旅时代行业转型带来的人才需求变化，提出了人才培养模式的系统性重构策略[52]。

在智慧文旅赋能乡村振兴领域，蔡保忠等（2023）系统梳理了我国智慧文旅发展的现状、模式与创新路径，明确了人才培养创新是产业发展的核心支撑[1]；许彦、蔡保忠（2024）、尹春玲（2025）分别

梳理了智慧文旅助力乡村振兴的国际经验，均将“外引内培”夯实智慧文旅人才队伍作为核心对策[53][54]；徐金泽等（2025）通过浙江安吉余村的案例分析，揭示了数字经济对乡村旅游业的赋能效应，提出了智慧文旅平台赋能乡村旅游的发展模式[55]。

2.2.3. 研究述评

综合来看，国内外相关研究已积累了丰富的理论成果与实践经验，为本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与方法参照，但仍存在三方面的拓展空间：其一，现有研究多聚焦全国通用模式或西南、西北民族地区，针对中部湖北民族地区的专项研究相对匮乏，本土化适配性不足；其二，多数研究将乡村文旅、职业教育、民族文化三大维度割裂探讨，尚未形成三者深度融合的系统性研究框架，对智慧文旅新业态的关注仍有待深化；其三，现有校地协同研究多停留在“校企合作”的二元主体层面，对政府、乡村社区等多元主体的协同机制探讨不足，且针对乡村智慧文旅场景的协同育人模式研究仍较为零散，尚未形成成熟的可复制范式。基于此，本研究立足湖北民族地区的本土禀赋，将智慧文旅产业转型、民族文化传承与职业教育校地协同育人深度结合，构建本土化的协同育人模式，以期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

3. 湖北民族地区乡村智慧文旅校地协同育人的现实图景与问题诊断

3.1. 湖北民族地区乡村智慧文旅产业发展与人才需求特征

湖北民族地区地处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拥有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与底蕴深厚的土家族、苗族民族文化，是湖北省乡村文旅发展的核心增长极。近年来，随着数字乡村建设与文旅深度融合战略的推进，恩施州、长阳与五峰自治县纷纷布局智慧文旅建设，通过搭建智慧旅游平台、推广数字导览、发展直播电商、打造沉浸式民族文化体验项目等方式，推动乡村文旅产业从传统观光型向智慧体验型转型。智慧文旅产业的转型升级，对人才能力结构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呈现出三大核心特征。

一是能力维度复合化。乡村智慧文旅人才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导游讲解、酒店服务等基础技能，而是需要同时掌握智慧景区运营、短视频营销、数字导览设备操作、客户数据分析等数字技术能力，具备民族文化讲解、非遗活化展示等文化传承能力，以及乡村文旅项目策划、社区运营管理等综合运营能力[1]。

二是人才供给本土化。乡村智慧文旅项目深度嵌入在地社区，需要从业者熟悉本地民族文化与乡村社会环境，能够长期扎根乡村开展服务与运营。外来人才往往存在文化适配性不足、留存率低等问题，本土化人才培养成为破解乡村智慧文旅人才缺口的核心路径[53]。

三是成长场景在地化。乡村智慧文旅的岗位场景分散在各个乡村点位，难以通过单一的校园教学完成能力培养，需要依托真实的乡村文旅项目开展实践教学，在真实场景中完成能力的迭代升级。

3.2. 湖北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校地协同育人的现有实践

当前湖北民族地区职业院校已围绕乡村文旅人才培养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校地协同实践，主要包括三类模式：其一，订单式培养模式，即职业院校与地方文旅企业合作，针对特定岗位需求制定人才培养方案，企业参与课程教学与实践指导，学生毕业后定向进入企业就业；其二，实训基地共建模式，即院校与地方景区、民宿集群、研学基地合作建设校外实训基地，为学生提供岗位实践场所，企业导师承担部分实践教学任务；其三，项目化合作模式，即院校师生团队承接地方乡村文旅的规划设计、营销推广、活动策划等真实项目，以项目为载体开展实践教学，同时服务地方产业发展。

整体来看，现有协同实践已取得一定成效，为地方输送了一批文旅技能人才，但合作层次整体偏浅，多数仍停留在短期实习、简单订单培养的层面，尚未形成覆盖人才培养全链条、多元主体深度联动的协

同育人体系，难以适配乡村智慧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需求。

3.3. 核心问题诊断

3.3.1. 多元主体协同性不足，协同机制浅层化

当前校地协同的参与主体仍以职业院校与文旅企业为主，政府的统筹引导作用、乡村社区的主体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呈现出“校热企冷、政校脱节、社区缺位”的特征[2]。政府层面多以政策号召为主，缺乏具体的激励政策与资金扶持，未能有效搭建校地对接的公共平台；企业参与育人的动力不足，多数仅提供实习岗位，较少深度参与人才培养方案制定、课程体系建设等核心环节；乡村社区作为乡村文旅的承载主体，基本处于被动接受状态，未能充分参与到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四大主体之间缺乏稳定的协同机制与利益联结纽带，合作往往依赖个人关系维系，短期化、碎片化特征明显，难以形成长效协同合力[40]。

3.3.2. 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脱节，适配性不足

现有职业院校文旅类专业的人才培养体系仍以传统文旅岗位为核心，课程内容更新滞后于智慧文旅产业的发展节奏，数字技术类、民族文化类、乡村运营类课程占比偏低，导致学生的能力结构与产业需求存在结构性错位[51]。一方面，智慧文旅相关的新技术、新场景、新标准未能及时融入课程体系，学生的数字技术应用能力不足，难以胜任智慧景区运营、数字营销等新型岗位；另一方面，人才培养的本土化特征不突出，对湖北民族地区的土家族、苗族文化融入不足，学生对在地文化的理解与表达能力薄弱，难以满足乡村文旅对文化传播的需求[45]。此外，实践教学环节多以校内模拟实训为主，真实乡村文旅场景的实践占比偏低，学生的岗位实操能力与问题解决能力有待提升。

3.3.3. 民族文化与智慧文旅融合度低，特色不鲜明

湖北民族地区拥有丰富的非遗资源、民俗文化与地域文化，是乡村智慧文旅的核心吸引力所在，但当前校地协同育人中对民族文化的挖掘与利用明显不足[35]。一方面，课程体系中民族文化相关内容多以通识讲座、选修课程的形式存在，未能与智慧文旅的技术应用、项目运营深度融合，学生难以掌握将民族文化进行数字化转化、沉浸式呈现的能力；另一方面，协同育人的实践项目多聚焦通用型文旅服务，较少围绕民族文化活化、非遗数字化传播等特色场景设计实践任务，未能充分发挥民族地区的文化禀赋优势，导致人才培养同质化严重，缺乏区域特色与核心竞争力。

3.3.4. 长效运行机制缺失，协同持续性弱

校地协同育人的持续推进需要完善的保障机制作为支撑，但当前湖北民族地区相关的保障体系仍不健全[37]。制度层面，缺乏针对校地协同育人的考核评价机制、利益分配机制与风险共担机制，企业与社区参与育人的成本与收益不匹配，参与动力难以持续；资源层面，校地之间的师资、场地、项目、数据等资源尚未实现开放共享，存在资源壁垒与信息孤岛；师资层面，院校教师的乡村文旅实践经验与数字技术能力不足，企业导师的教学能力与规范意识有待提升，双向流动的双师队伍共育机制尚未建立。

4. 湖北民族地区乡村智慧文旅职业教育校地协同育人模式构建

针对上述现实困境，结合湖北民族地区的产业特征与资源禀赋，本研究构建“四维联动、三阶递进、双向赋能”的乡村智慧文旅职业教育校地协同育人创新模式，以本土化智慧文旅人才培养为核心目标，推动多元主体深度协同，实现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的双向增益。

4.1. 模式整体框架

该模式以协同学理论为核心支撑，以“政府引导、院校主体、村社承载、企业参与”为四维联动主体，以“基础能力培养—岗位实践历练—在地创业孵化”为三阶递进培养路径，以“人才培养赋能产业升级、产业发展反哺教育改革”为双向赋能运行逻辑，形成主体联动、层级递进、闭环反馈的完整育人体系。模式的核心是打破校园边界，将人才培养的场景延伸至乡村社区与文旅企业，将民族文化资源、智慧技术与真实产业项目融入育人全过程，培养“懂民族文化、会智慧技术、能扎根乡村、善文旅运营”的本土化复合型技能人才。

4.2. 四维联动主体架构

四维联动主体包括政府、职业院校、乡村社区、文旅企业四大主体，各主体权责清晰、优势互补、利益共享，共同构成协同育人的有机整体。

4.2.1. 政府：统筹引导者

政府包括地方教育主管部门、文旅主管部门、乡村振兴局与民族宗教事务部门，其核心权责是做好顶层设计与政策保障：一是制定校地协同育人的扶持政策，设立专项引导资金，对参与协同育人的企业、社区给予税收减免、项目倾斜等激励；二是搭建校地对接公共平台，建立供需对接机制，推动院校与地方文旅资源、产业项目精准对接；三是统筹区域内民族文化、数字技术等公共资源，为协同育人提供公共服务支撑；四是建立协同育人的质量监管与评价机制，引导协同育人规范有序发展[5]。

4.2.2. 职业院校：核心实施者

职业院校是人才培养的核心主体，承担人才培养方案制定、课程体系构建、理论教学组织、师资队伍建设等核心职能。在校地协同中，院校需主动对接地方产业需求，将产业标准、岗位能力与真实项目融入教学体系，推动师资队伍与企业、社区双向流动，联合开展实践教学与项目研发，同时为地方提供人才培训、技术支持与文化创意服务，实现教育与产业的深度对接[38]。

4.2.3. 乡村社区：场景承载者

乡村社区是乡村智慧文旅的空间载体与文化载体，也是人才扎根就业的核心场域。社区的核心作用包括：一是提供真实的乡村文旅实践场景与在地文化资源，承接学生的岗位实践与项目实训；二是组织在地村民、非遗传承人参与育人过程，传递本土文化与乡村运营经验；三是作为人才落地的承接主体，为毕业生提供就业创业场景与社区支持，推动人才本土化留存。

4.2.4. 文旅企业：产业对接者

文旅企业是产业需求的传递者与实践教学的重要参与者，其核心权责包括：一是向院校反馈产业最新的岗位需求与能力标准，参与人才培养方案制定与课程开发；二是提供实习岗位与企业导师，承担学生的岗位实践指导任务；三是将真实的运营项目、营销项目、服务项目引入教学过程，以项目化教学提升学生的实操能力；四是优先录用协同培养的毕业生，为人才提供就业发展通道[50]。

4.3. 三阶递进培养路径

结合职业能力形成的规律，构建从基础到进阶、从校园到乡村的三阶递进培养路径，实现能力的阶梯式提升。

4.3.1. 第一阶：基础能力培养阶段

该阶段主要在校内完成，时长约为前两个学年。核心任务是夯实学生的专业基础能力，构建“通用素养+专业技能+数字技术+民族文化”的四维基础能力体系。通用素养包括职业素养、法治素养、沟通能力等；专业技能包括文旅服务、项目策划、运营管理等核心专业技能；数字技术包括智慧文旅设备操作、新媒体营销、数据分析等基础数字能力；民族文化包括湖北土家族、苗族的历史文化、民俗风情、非遗技艺等本土文化知识。该阶段可引入企业导师、非遗传承人开展专题讲座与案例教学，让学生建立对产业与本土文化的初步认知[32]。

4.3.2. 第二阶：岗位实践历练阶段

该阶段采用“校地交替”的模式，时长约为第三学年上学期。核心任务是让学生进入真实的乡村智慧文旅场景开展岗位实践，在真实工作中锤炼实操能力。学生分批进入合作的乡村社区、文旅企业、研学基地等实践点位，围绕景区智慧运营、民宿数字化服务、乡村文旅营销、民族文化讲解等岗位开展跟岗实训与顶岗实习。院校教师与企业导师、社区导师共同组成指导团队，对学生的实践过程进行全程指导与评价，将实践过程转化为学分与教学成果，实现做中学、学中做[51]。

4.3.3. 第三阶：在地创业孵化阶段

该阶段面向有创业意愿的学生，时长覆盖第三学年下学期及毕业初期。核心任务是依托地方乡村文旅资源，支持学生开展本土化创业实践。院校与地方政府、文旅企业联合搭建创业孵化平台，为学生提供创业指导、项目孵化、政策对接、资源链接等支持，鼓励学生围绕民族文化数字化传播、乡村民宿运营、研学产品开发、直播电商等方向开展创业项目。该阶段既是人才培养的延伸，也是推动人才本土化留存、赋能乡村产业发展的关键环节。

4.4. 双向赋能运行逻辑

模式的运行遵循“双向赋能、闭环反馈”的逻辑，实现教育与产业的良性互动。一方面，人才培养赋能产业发展：通过校地协同培养的本土化智慧文旅人才，能够直接补充地方乡村文旅产业的人才缺口，提升产业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与服务水平，同时师生团队的技术服务、创意策划也能直接助力乡村文旅项目的智慧化升级与文化内涵提升，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产业发展反哺教育改革：产业升级带来的新岗位、新技术、新标准会及时反馈到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体系中，推动课程内容更新、教学模式改革与师资能力提升，同时产业也为院校提供更多实践场景、项目资源与就业渠道，持续优化育人条件。双向赋能形成良性循环，推动校地协同持续深化[43]。

5. 湖北民族地区乡村智慧文旅校地协同育人的实施路径

为保障模式落地见效，结合湖北民族地区实际，从专业共建、课程共融、基地共建、师资共育、成果共享五个维度设计具体实施路径。

5.1. 专业共建：对接产业需求重构专业体系

职业院校应主动对接湖北民族地区乡村智慧文旅产业发展需求，优化专业布局与人才培养方案，推动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一是优化专业方向，在现有旅游管理、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等专业基础上，增设乡村智慧文旅、民族文旅数字化运营等特色方向，聚焦本土产业需求培养专项人才；二是联合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建立由政府主管部门、院校专业教师、企业高管、非遗传承人、社区代表共同

组成的专业建设委员会，定期研讨产业发展趋势与人才需求变化，动态修订人才培养方案，确保培养目标与产业标准同频[38]；三是推进岗课赛证融合，将智慧文旅运营师、民宿管家、研学旅行指导师等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标准融入课程体系，对接行业技能竞赛要求，实现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无缝衔接。

5.2. 课程共融：打造民族文化+智慧技术的课程体系

课程是人才培养的核心载体，需围绕乡村智慧文旅人才的能力画像，构建“文化赋能、技术支撑、实践导向”的特色课程体系。一是增设智慧文旅技术模块，开设智慧景区运营、文旅新媒体营销、文旅数据分析、数字导览系统应用等课程，提升学生的数字技术应用能力[52]；二是深化民族文化融入，开发土家族苗族文化概论、湖北非遗活化与数字化传播、乡村民俗活动策划等特色课程，将民族文化元素贯穿专业课程全过程，避免文化与专业“两张皮”[35]；三是强化项目化课程设计，以地方真实的乡村文旅项目为载体，设计项目式、任务式的课程单元，让学生在完成真实项目的过程中整合知识、提升能力；四是建设本土化教学资源库，联合地方文旅部门、企业共同开发湖北民族地区乡村智慧文旅的典型案例、项目素材、数字资源，形成特色化教学资源包。

5.3. 基地共建：搭建校地联动的实践育人平台

实践基地是开展校地协同育人的重要载体，需构建“校内实训中心+校企共建基地+乡村实践点位”三级联动的实践育人平台体系。一是升级校内实训中心，建设智慧文旅模拟实训室、民族文旅数字创意实训室等，引入智慧景区系统、数字营销仿真平台等，为学生提供模拟实训场景[50]；二是深化校企共建基地，与地方龙头文旅企业、核心景区、研学基地共建高水平校外实践教学基地，明确双方的权责与合作内容，建设集教学、培训、研发、服务于一体的产教融合基地；三是布局乡村实践点位，在民族地区的乡村旅游重点村、民宿集群、非遗工坊等设立实践教学点位，承接学生的在地实践与项目实训，将课堂搬到乡村文旅一线；四是建立基地运行管理制度，制定实践教学标准、导师管理制度、学生考核办法等，保障实践教学质量。

5.4. 师资共育：构建双向流动的双师队伍体系

高素质的师资队伍是协同育人质量的核心保障，需建立校地双向流动、专兼结合的双师队伍共育机制。一是实施教师下基层实践计划，定期选派院校专业教师到乡村文旅企业、社区文旅站点挂职锻炼，参与实际运营与项目运作，提升实践教学能力与产业认知水平；二是聘请产业导师与文化导师，选聘文旅企业的技术骨干、运营管理人员，以及乡村的非遗传承人、文旅带头人担任兼职教师，参与课程教学、实践指导与项目研发，充实师资队伍的实践力量[37]；三是开展师资联合培训，定期组织校地教师共同参加智慧文旅技术、民族文化传承、职业教育教学法等专题培训，提升师资队伍的综合能力；四是建立双师评价激励机制，将教师参与校地协同、产业服务的成果纳入职称评审与绩效考核，提升教师参与的积极性。

5.5. 成果共享：实现教育与产业的双向价值输出

校地协同不仅是人才培养的过程，也是校地资源共享、价值共创的过程，需推动成果双向转化、互利共赢。一方面，院校向地方输出智力成果，组织师生团队为地方乡村文旅项目提供规划设计、营销推广、数字化改造、人员培训等技术服务，助力地方文旅产业提质升级；另一方面，地方向院校输出产业资源，将真实项目、产业数据、文化资源等开放给院校，支持院校开展教学改革与科研创新[44]。此外，校地联合开展民族文化的数字化保护与传播，共同打造民族文旅 IP，既丰富教学资源，也助力地方文化

品牌建设，实现教育价值、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统一。

6. 湖北民族地区校地协同育人的保障机制

6.1. 政策保障

地方政府应出台专项扶持政策，为校地协同育人提供制度支撑。一是设立乡村智慧文旅校地协同育人专项经费，对合作项目、实训基地建设、师资培养等给予资金补贴；二是制定激励政策，对深度参与育人的文旅企业给予税收优惠、项目优先申报等奖励，对参与协同育人的社区给予乡村振兴项目倾斜；三是完善配套政策，将校地协同育人纳入职业教育考核与乡村振兴工作考核体系，引导各方重视并推进协同育人工作。

6.2. 组织保障

建立跨部门、跨主体的协同育人工作领导小组，由地方政府分管领导牵头，教育、文旅、乡村振兴、民宗等部门负责人，以及职业院校、重点企业、典型村社的代表共同组成，统筹推进区域内校地协同育人工作。领导小组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协调解决协同过程中的重大问题，对接供需资源，制定年度工作计划，监督项目推进情况，形成常态化的协同工作机制。

6.3. 资源保障

推动校地之间的资源开放共享，打破资源壁垒。一是搭建区域智慧文旅教育资源共享平台，整合校地的课程资源、实训资源、项目资源、师资资源等，实现资源在线对接与高效利用；二是保障实践教学资源供给，地方政府协调辖区内的景区、民宿、非遗工坊等向职业院校开放，为实践教学提供场景支撑；三是加大数字资源投入，完善乡村实践点位的网络环境与数字设备，为智慧文旅实践教学提供硬件支撑。

6.4. 制度保障

建立健全协同育人的配套管理制度，保障合作规范长效运行。一是建立利益共享与风险共担制度，明确各方在合作中的投入、收益与责任，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利益联结机制；二是建立质量评价与反馈制度，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育人质量评价体系，定期对育人成效、产业贡献等进行评价，及时反馈问题并优化调整；三是建立知识产权保护与成果转化制度，明确校地合作产生的成果归属与转化收益分配规则，保护各方的合法权益，激发合作动力。

7. 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立足湖北民族地区乡村智慧文旅产业发展的人才需求，针对当前职业教育校地协同育人存在的现实困境，构建了“四维联动、三阶递进、双向赋能”的校地协同育人创新模式，并提出了具体的实施路径与保障机制。研究表明，乡村智慧文旅人才培养不能局限于校园内部的教学改革，必须打破校地边界，推动政府、院校、乡村社区、文旅企业多元主体深度协同，将民族文化禀赋、智慧技术应用与真实产业场景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才能培养出适配产业需求的本土化复合型技能人才。

本研究虽聚焦湖北民族地区，但构建的模式与路径对中部同类民族地区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扩大调研样本范围，通过更长周期的行动研究对模式进行迭代优化，同时探索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新技术在校地协同育人中的深度应用，持续提升育人效能与产业适配性。

基金项目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智慧文旅职业教育专业委员会 2026 年度旅游职业教育改革研究课题“湖北民族地区乡村智慧文旅职业教育校地协同育人模式创新研究”（ZJ2026LY26）资助。

参考文献

[1] 蔡保忠，李晶，刘进，何真. 我国智慧文旅发展的现状、模式与路径创新研究[J]. 中阿科技论坛(中英文)，2023，(05)：1-6+17.

[2] 唐智彬. 论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校地协同发展模式——基于社会资本视角的探讨[J]. 职教论坛，2018，(03)：30-35.

[3] Schultz T W.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1, 51: 1-17.

[4] Haken H. Synergetics: an introduction, nonequilibrium phase transitions and self-organization in physics, chemistry, and biology[M]. Berlin: Springer-Verlag, 1969.

[5] 朱德全，石献记. 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技术逻辑与价值旨归[J]. 中国电化教育，2021，(01)：41-49.

[6] Reimer E. School is dead: alternatives in education[M]. New York: Doubleday & Company, 1971.

[7] Shinn G C, Cheek J G. Agricultural teacher education functions can be delivered more effectively through a depart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J].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ducation, 1981, 22(2): 3–8.

[8] Wettayaprasit P, Birkenholz R J. program model for secondary agricultural education in Thailand[J].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ducation, 1995, 36(3): 8–16.

[9] Stone C. School-Community Collaboration: Comparing Three Initiatives[J]. Phi Delta Kappan, 1995, 76(10): 794-796+798-800.

[10] Lockwood A T. School-Community Collaboration[J]. New Leaders for Tomorrow’s Schools, 1996, 2(1): 1-36.

[11] Luft V D. Extent to which cultural diversity is addressed in secondary agricultural education[J].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ducation, 1996, 37(3): 67–75.

[12] Sanders M G, Harvey A. Beyond the school walls: A case study of principal leadership for school-community collaboration[J]. Teachers college record, 2002, 104(7): 1345-1368.

[13] Strathdee 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nd social capital in New Zealand[J]. Journal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 Training, 2003, 55: 65-84.

[14] Zeppel H. Indigenous ecotourism: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M]. Oxford: CABI, 2006.

[15] Cooper J G, Kotval-K Z, Kotval Z, et al. University Community Partnerships[J]. Humanities, 2014, 3(1): 88-101.

[16] Drahota A, Meza R D, Brikho B, et al. Community-Academic Partnerships: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State of the Literature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J]. The Milbank quarterly, 2016, 94(1): 163–214.

[17] Naví o-Marco J, Ruiz-Gómez L M, Sevilla-Sevilla C. Progress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ourism management: 30 years on and 20 years after the internet-Revisiting Buhalis & Law’s landmark study about eTourism[J]. Tourism management, 2018, 69: 460-470.

[18] Khatri I.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tourism & hospitality industry: A review of ten years’ publications[J]. Journal of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Education, 2019, 9: 74-87.

[19] Yuan Y, Tseng Y H, Ho C I. Tourism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search trends: 1990-2016[J]. Tourism review, 2019, 74(1): 5-19.

[20] Cai W, Richter S, McKenna B. Progress on technology use in tourism[J]. Journal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Technology, 2019, 10(4): 651-672.

[21] Muniz E C L, Dandolini G A, Biz A A, et al. Customer 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smart tourism destinations: a framework for the smart management of the tourist experience–SMARTUR[J]. Journal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2021, 25(5): 1336-1361.

[22] Asif M, Fazel H. Digital technology in tourism: a bibliometric analysis of transformative trends and emerging research patterns[J]. Journal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Insights, 2024, 7(3): 1615-1635.

[23] Ferreira M L, Kastenholz E. Generative AI in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a dual-stakeholder perspective on tourist and workforce experience dynamics[J]. Tourism Review, 2026: 1-24.

[24] Prasetya F, Fortuna A, Samala A D, et al. Harness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revolutionize vocational education: Emerging trends, challenges, and contributions to SDGs 2030[J]. Social Sciences & Humanities Open, 2025, 11: 101401.

[25] 郭锐，王济，沈虹，龙永平，周洪梅. 乡村旅游职业教育及发展对策——以贵州省贵阳市为例[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8，(33)：29-31.

[26] 苏林忠. 乡村旅游与农村旅游职业教育的发展[J]. 开封大学学报，2010，24(04)：3-5.

[27] 刘玉芝. 乡村旅游职业教育发展模式探究[J]. 经济研究导刊，2011，(10)：257-258.

[28] 周志宏. 乡村旅游职业教育发展困境和发展路径研究[J]. 中国农学通报，2012，28(17)：242-245.

[29] 李小娟. 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对旅游职业教育创新发展的影响[J]. 旅游纵览(下半月)，2015，(12)：244-245.

[30] 崔萃. “互联网＋”时代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旅游探讨[J]. 合作经济与科技，2016，(22)：146-147.

[31] 林丽. 用阳光心态开拓职业教育新领域——以职业教育标准打造乡村旅游联盟特色项目研讨[J]. 旅游纵览(下半月)，2016，(02)：235+237.

[32] 张博文，涂运根. 本土化视野下高等旅游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探讨——以民族地区高等旅游院校特色发展为例[J]. 学园，2009，(03)：75-79.

[33] 黄爱莲，周坤顺. 西部民族地区旅游专业“产学研”合作教育探索[J]. 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1(S1)：112+114.

[34] 乔联蓉. 民族地区高等专科学校旅游职业教育培养目标研究[J]. 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26(01)：110-112.

[35] 吴婷婷，张栋科，史玉丁. 民族文化融入渝东南旅游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研究[J]. 当代职业教育，2015，(09)：34-36.

[36] 苏晓红，杨秀益. 贵州职业教育旅游工艺品设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基于民族文化传承视野[J]. 高等职业教育(天津职业大学学报)，2016，25(04)：41-44+61.

[37] 柳建华. 校地协同育人与乡村振兴：保障措施与实施路径——高等职业教育的视角[J].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9，(02)：40-43.

[38] 朱运海，崔俊涛，汪胜兰，向金利. 基于 CBE 的地方高校旅游管理专业产教融合校地协同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以湖北文理学院旅游管理专业为例[J]. 湖北文理学院学报，2021，42(05)：84-88.

[39] 张志增.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与改革发展农村职业教育[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7，(34)：121-126.

[40] 张旭刚. 农村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实践困境与治理路径[J]. 职业技术教育，2018，39(10)：59-64.

[41] 路艳娇. 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农村职业教育创新发展策略——以黑龙江省为例[J]. 职业技术教育，2019，40(06)：52-56.

[42] 马宽斌，黄丽丽. 乡村振兴战略：农村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新动能[J]. 成人教育，2020，40(02)：47-51.

[43] 孙红霞. 农村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内在机理、现实困境及具体策略[J]. 农业经济，2021，(11)：128-129.

[44] 朱忠义，郭广军，周凌博. 高职教育产教融合赋能乡村振兴战略的问题与推进策略[J]. 教育与职业，2021，(15)：12-18.

[45] 蒋友财，邹雪. 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旅游产业与高等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路径探索——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为例[J]. 旅游纵览(下半月)，2018，(22)：58-59.

[46] 李晓鹏，陈芝昕璐. 贵州职业教育中山地旅游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以黔西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为例[J]. 旅游纵览(下半月)，2018，(08)：187+189.

[47] 贺菁，朱丽丽. 谈职业教育中旅游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优化——以黔西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为例[J]. 旅游纵览(下半月)，2018，(02)：209-210.

[48] 贾巧云，刘益. 基于教学需求调查的南疆民族地区旅游高等教育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探讨[J]. 旅游纵览(下半月)，2019，(12)：224-227.

[49] 张骏，卢凤萍，顾至欣. 科技革命视阈下文旅融合旅游职教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研究[J]. 职业技术，2022，21(05)：18-23.

[50] 陈丹，黄雄英，梅早旺. 智慧文旅时代旅游专业校企合作实践基地建设研究[J]. 现代商贸工业，2022，43(17)：75-77.

[51] 周泓伶. 智慧文旅背景下高职旅游管理专业校企合作实践教学模式研究[J]. 中原文化与旅游，2025，(22)：201-203.

[52] 陈荟如. 智慧文旅背景下高职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J]. 西部旅游，2025，(17)：87-89.

[53] 许彦，蔡保忠. 智慧文旅助力乡村振兴的国际经验与政策启示[J].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24，45(01)：96-100.

[54] 尹春玲. 智慧文旅赋能乡村振兴的国际借鉴[J]. 南方农机，2025，56(07)：81-85.

[55] 徐金泽，富晓强，许永强. 智慧文旅平台赋能乡村旅游发展模式研究[J]. 城市建设理论研究(电子版)，2025，(02)：226-228.